



陈平原 著

大學何為

(修订版)



正因为中国大学仍“在路上”，既非十全十美，也不是朽木不可雕，这才值得你我去追踪，去思考，去参与。

——陈平原

| 大学五书 |

大学何为

(修订版)

陈平原 著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学何为 / 陈平原著. — 3版(修订版). — 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 2016.1
(大学五书)

ISBN 978-7-301-26356-3

I. ①大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高等教育-研究-中国-现代 IV. ①G649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37836号

- | | |
|-------|--|
| 书 名 | 大学何为(修订版) |
| | Daxue Hewei |
| 著作责任者 | 陈平原 著 |
| 责任编辑 | 于铁红 |
| 标准书号 | ISBN 978-7-301-26356-3 |
| 出版发行 | 北京大学出版社 |
| 地 址 |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|
| 网 址 | http://www.pup.cn 新浪微博: @北京大学出版社 @培文图书 |
| 电子信箱 | zpup@pup.cn |
| 电 话 | 邮购部62752015 发行部62750672 编辑部62750112 |
| 印 刷 者 |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|
| 经 销 者 | 新华书店 |
| | 889毫米×1194毫米 32开本 13印张 230千字 |
| | 2006年5月第1版 2009年3月第2版 |
| | 2016年1月第3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|
| 定 价 | 55.00元 |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。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举报电话: 010-62752024 电子信箱: fd@pup.pku.edu.cn

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部联系, 电话: 010-62756370

目 录

“大学五书”小引	/ 001
自序	/ 003

第一辑 大学之道

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大学	/ 015
大学排名、大学精神与大学故事	/ 050
大学公信力为何下降	/ 085
——从“文化的观点”看“大学”	
全球化时代的“大学之道”	/ 105
为大学校长“正名”	/ 119
我为什么反对一流学者当校长	/ 126
我看“大学生就业难”	/ 134

第二辑 北大情怀

大学三问	/ 143
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	/ 165
——我的大学观	

我看北大百年变革	/ 172
北大边缘人	/ 193
书法的北大	/ 203
“好读书”与“求甚解”	/ 216
——我的“读博”经历	

第三辑 学院内外

大学精神与大学的功用	/ 229
——答《人民日报》记者徐怀谦问	
博士论文只是一张入场券	/ 248
——答《中华读书报》记者祝晓风问	
学院的“内”与“外”	/ 261
——答《读书时报》记者熊彦清问	
学者与传媒	/ 277
——答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许燕问	
我的“八十年代”	/ 313
——答旅美作家查建英问	
陈平原、饶毅教授共话北大发展	/ 365
修订版后记	/ 410

“大学五书”小引

陈平原

不提撰写博士论文时如何邂逅晚清及五四的大学教育，就从1996年春夏编《北大旧事》说起，二十年间，我在自家专业之外，持续关注中国教育问题，竟然成了半个“大学研究”专家。

我之谈论大学问题，纵横文学与教育，兼及历史与现实，包容论著与时评，如此思路与笔墨，说好听是“别有幽怀”，说不好听则是“不够专业”。好在我不靠这些文章评职称，故不太在乎学院派的态度。

作为业余教育史家的我，多年前曾说过：“从事学术史、思想史、文学史的朋友，都是潜在的教育史研究专家。因为，百年中国，取消科举取士以及兴办新式学堂，乃值得大书特书的‘关键时刻’。而大学制度的建立，包括其蕴涵的学术思想和文化精神，对于传统中国的改造，更是带根本性

的——相对于具体的思想学说的转移而言。”这也是我不避讥讽，时常“野叟献曝”，且长枪短棒一起上的缘故。

正因不是学术专著，没有统一规划，先后刊行的各书，呈犬牙交错状态。乘《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》出版之际，将我此前在北大出版社刊行的四册有关大学的书籍重新编排，作为“大学五书”推出。其中《老北大的故事》大致稳定，《读书的“风景”》只删不增，调整幅度较大的是《大学何为》和《大学有精神》。

很多年前，我在《北大精神及其他》（上海文艺出版社，2000年）的“后记”中称：“这是一个能够调动研究者的激情与想象力、具备许多学术生长点的好题目，即便山路崎岖，前景也不太明朗，也都值得尝试。”今天依然故我，只要机缘成熟，还会深度介入教育话题。

因此，“大学五书”只是阶段性成果，但愿日后还有更精彩的表现。

2015年5月18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

附记：考虑到去年第三次印刷的《读书的“风景”》仍在销售，“大学五书”改收新编的《大学新语》。特此说明。

2015年10月28日

自序

将近年所撰关于大学的文章结集成书，总该有个理由。比如，跟本人已刊诸书相比，是否有所推进？相对于学界同人的著述，又有哪些特点？即便没能在理论上独树一帜，起码也得在学术思路或写作策略上显示自家面目。记得小时候过年，最常见的对联是：“天增岁月人增寿，春满乾坤福满门”；可这不能成为爆竹声中编排新书的充足理由。还是略为回顾各文的写作经过，也算是给自家著述添加若干略带广告性质的注脚。

作家查建英采访时，曾追问我在2003年北大改革论争中的立场：“那场争论当中，人文学者是反对张维迎改革方案的主力，而社科学者，特别是经济学家们，则是支持的主力。我觉得你的态度在人文学者里比较少见，你始

终保持一个温和的调子来讨论问题，你赞成的似乎是一种‘保守疗法’，一种稳健的逐步的改革。”（参见本书《我的“八十年代”》一文）这是一个很敏锐的观察。确实如此，我谈北大改革四文，虽然也入各种集子（如沈颖主编《燕园变法》，上海文化出版社，2003年9月；博雅主编《北大激进变革》，华夏出版社，2003年9月；钱理群、高远东编《中国大学的问题与改革》，天津人民出版社，2003年10月；甘阳、李猛编《中国大学改革之道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04年1月），但不是这场论争的代表性论述。因为，针对性不强，基本上是自说自话；作为论辩文章读，不过瘾。

为什么？并非不晓得报章文体倾向于“语不惊人死不休”，只因我更欣赏胡适创办《独立评论》时所说的，作为专家而在公共媒体上发言，要说负责任的话，既不屈从于权威，也不屈从于舆论。大学改革，别人说好说坏，都可以斩钉截铁，我却深知兹事体大，休想快刀斩乱麻、毕其功于一役。历史证明，那样做，不只不现实，而且效果不好。

相对于论战诸君，我之立论稍微不同，很大原因在于，我对百年中国大学（尤其是北大）有过若干研究。已经刊行的《北大旧事》《老北大的故事》《北大精神及其他》《中

国大学十讲》等，不敢说有多精彩，但起码让我对中国大学的历史与现状有较多的了解。理解大学问题的复杂性，理解改革的代价，也理解各种冠冕堂皇的口号背后，很可能隐含着利益争夺甚至各种卑污的权谋。因此，与其说我在参加论战，不如说我在延续已有的叩问与思考——叩问大学的历史与现实，思考大学的理念与实践。

正如德里达说的，“大学存在于它企图思考的世界之中”，要想承担起历史责任，组织一种创造性的抵抗——“抵抗一切（政治、司法、经济等，对大学）的重占企图，抵抗一切其他形式的主权形态”（参见杜小真、张宁主编《德里达中国讲演集》，134页），其实是十分艰难的。尤其在当代中国，谈论大学改革，涉及理想与现实、中国与西方、制度与精神、个人与国家等，远不只是制订若干操作手册那么简单。

在《大学三问》中，我特别强调：“今天谈论大学改革者，缺的不是‘国际视野’，而是对‘传统中国’以及‘现代中国’的理解与尊重。”而在《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》中，我又认定：“大学不像工厂或超市，不可能标准化，必须服一方水土，才能有较大的发展空间。百年北大，其迷人之处，正在于她不是‘办’在中国，而是‘长’在中国——跟多灾多难而又不屈不挠的中华民族一起走过来，流血

流泪，走弯路，吃苦头，当然也有扬眉吐气的时刻。你可以批评她的学术成就有限，但其深深介入历史进程，这一点不应该被嘲笑。如果有一天，我们把北大改造成为在西方学界广受好评、拥有若干诺贝尔奖获得者，但与当代中国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思想进程无关，那绝对不值得庆贺。”如此强调大学植根于本民族的历史文化情境，无法简单复制，故全书以“大学之道”起兴，而不以关于北大改革诸文开篇。在我看来，后者只是波澜壮阔的中国大学改革的一个小小的插曲，好戏——或者烂戏——还在后头呢。

“中国经验”，尤其是百年中国大学史，是我理解“大学之道”的关键。我当然明白，今日中国的大学制度，主要是“旁采泰西”而不是“上法三代”的结果。因此，在思考及论述中，除了孔夫子以降的历史经验，更倚重西贤有关论述。比如，关注“大学的理想”（参见约翰·亨利·纽曼著、徐辉等译《大学的理想》，杭州：浙江教育出版社，2001），也探究“大学的功用”（参见 Clark Kerr 著、陈学飞等译《大学的功用》，南昌：江西教育出版社，1993）；思考“学术责任”（参见唐纳德·肯尼迪著、阎凤桥等译《学术责任》，北京：新华出版社，2002），也努力“走出象牙塔”（参见德里克·博克著、徐小洲等译《走出象牙塔——

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》，杭州：浙江教育出版社，2001）；进入“美国校园文化”（参见亨利·罗索夫斯基著、谢宗仙等译《美国校园文化——学生·教授·管理》，济南：山东人民出版社，1996），也面向“21世纪的大学”（参见詹姆斯·杜德斯达著、刘彤等译《21世纪的大学》，北京：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05）。教育学家的著述固然精彩，以下三段关于大学的评说，同样或者更让我感动：

大学是研究和传授科学的殿堂，是教育新人成长的世界，是个体之间富有生命的交往，是学术勃发的世界。每一任务借助参与其他任务，而变得更有意义和更加清晰。（雅斯贝尔斯著、邹进译《什么是教育》，150页，北京：三联书店，1991）

为了实现人的潜能，为了克服我们政体不易于理解各种重要政体形式的倾向，大学必须站出来帮助孤立无援的理性。大学是容纳探索 and 思想开放的地方，它鼓励人们不是功利性地而是为了理性而利用理性，它提供一种气氛使哲学怀疑不至被道德风尚和占上风的势力吓倒，它保存伟大的行为、伟大的人物和伟大的思想，以使对潮流的挑战和置疑能够得到滋养。（布

鲁姆著、缪青等译《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》，268页，北京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1994）

大学，与所有类型的研究机构不同，它原则上（当然实际上不完全）是真理、人的本质、人类、人的形态的历史等等问题应该独立、无条件被提出的地方，即应该无条件反抗和提出不同意见的地方。（杜小真、张宁主编《德里达中国讲演集》，61页，北京：中央编译出版社，2003）

雅斯贝尔斯（Karl Jaspers，1883—1969）、布鲁姆（Allan Bloom，1930—1992）和德里达（Jacques Derrida，1930—2004），这三位大学者，政治立场以及学术面貌迥异，或存在主义、或保守主义、或解构主义；但作为哲学家或政治学家，他们都聚焦大学在急速变化着的当代世界中的地位与作用，都将人文学作为大学的核心，关注其跌宕起伏的命运，这是我所感兴趣的。或许，正因为他们不是教育专家，不太考虑技术层面的教育组织、教育管理、教育经济等，而集中精力在文化、精神、价值层面上思考大学问题，这样一来，反而能在“教育名著”视野之外，开辟广阔的思考及论述空间。而这也正是我切入“大学”的角度——在

在我看来，中国的大学改革，需要教育学家、历史学家、哲学家以及一切对教育感兴趣的读书人的共同参与。

谈论中国大学，可以是专业论文，也可以是专题演讲，还可以是随笔、短论、答问等。不完全是为本书之体例驳杂辩解，假如希望兼及历史与现实，确实不一定非高头讲章不可。或长枪，或短棒，或匕首，或弹弓，只要有效，不妨十八般武艺一齐上。我之不薄“演讲”，是因为特别看重公众对于“大学”这一社会组织及文化传统的自我反省能力。书中好些章节，是作者应邀在北大、清华、华师大、首都师大等为大学生、研究生所做的演讲稿。《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大学》的前四节是在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“大学精神、大学理念与校园文化”研讨会（成都）上的专题演讲，后两节则是在陕西电视台“开坛”节目中与各民办大学校长的对话。《大学之道——书院与二十世纪中国教育》以及《文学史视野中的“大学叙事”》虽是专业论文，却也曾在香港中文大学和日本京都大学组织的学术研讨会上宣读，并获广泛好评。（此两文已入他书，未收入本书。——编者注）至于在凤凰卫视“世纪大讲堂”上所做的专题演讲“中国大学百年”（文稿刊《中国大学教学》2005年10期），因主要观点已见《中国大学十讲》（复旦大学出版社，2002）中的同名论文，这次

不再收录。

一般说来，“演讲”以及“答问”，远不如“论文”专深，好处是体现一时代的文化氛围。假如你的拟想读者不是教育专家，而是关注中国大学命运的读书人，那么，采用这种现场感很强的“对话”姿态（包括保留听众的提问），未尝不是“讨巧”。作为一种生活方式、一种教育类型、一种论述策略、一种影响极为深远的独特文体，“对话”是人类探索真理以及认识自我的有效途径。不满足于传递或接受专业知识，更希望学习思考，追求真理，参悟人生，那么，永无止境的“叩问”与“对话”，是必不可少的一环。

这么说，类似胡适《〈尝试集〉再版自序》所自嘲的“戏台里喝彩”。其实，将论文与随感、演讲与答问、历史与现实、宏大叙事与私人记忆等掺和在一起，造成一种明显的“对话”状态，在我，不是有意为之，而是歪打正着。本书之“未完善”，正好对应着中国大学改革的“进行时”——正因为中国大学仍“在路上”，既非十全十美，也不是朽木不可雕，这才值得你我去追踪，去思考，去参与。

在这个意义上，本书的“学术思路”比“著述文体”更值得重视，那就是：从历史记忆、文化阐释、精神构建

以及社会实践等层面，思考“大学”作为人类社会极为重要的组织形式，是什么、有什么、还能做些什么。

丙戌正月初六，是日阳光普照，最低气温零下十度，浓郁的水仙花香中，编定全书并撰序。

